



辛亥革命  
研究论文集

金冲及 选编

上 卷

金冲及 选编

# 辛亥革命 研究论文集

上 卷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金冲及选编. --北京: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1  
ISBN 978-7-108-03806-7

I . ①辛… II . ①金… III . ①辛亥革命－纪念文集  
IV . ①K25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630号

# 目 录

## 上卷

论辛亥革命.....	吴玉章	1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胡 绳	12
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刘大年	24
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 .....	黎 澜	34
时代·祖国·乡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探.....	章开沅	61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金冲及	75

城市近代化与辛亥革命.....	隗瀛涛 何一民	82
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和辛亥革命.....	林增平	94
清末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	朱 英	103
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日] 容应萸	121
国内学堂学生与辛亥革命运动.....	桑 兵	132
论清末的铁路风潮.....	祁龙威	143
辛亥革命前的收回矿权运动.....	乔志强	174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李泽厚	182
晚清绅商阶层与辛亥革命.....	马 敏	200
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	龚书铎 陈桂英	220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王先明	237
华侨与辛亥革命.....	陈孔立 陈在正 林金枝 李国梁	255

租界与中国革命	陈三井	273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李文海	287
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	陈锡祺	304
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	金冲及 胡绳武	324
兴中会前期（1894—1900）孙中山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	吴伦霓霞	334
华兴会几个问题的研究	彭国兴	353
论光复会	胡国枢	379
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	沈寂	395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李云汉	406
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	章开沅	427
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		
——兼论同盟会在组织上的特点	金冲及 胡绳武	443
共进会——一个晚清的革命团体	冯兆基	464
略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和历史地位	王学庄 石芳勤	479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	金冲及	488
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	陈旭麓	500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	林增平	507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展	魏建猷	517
论清末新军向革命转化	陈文桂	528
清末防军与辛亥革命	李英铨	544
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	蒋永敬	554
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宣传	张玉法	563
论三民主义	张磊	58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形成的进程	姜义华	601
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	巴斯蒂	613
“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		
——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黄兴涛	629

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	狭间直树	649
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胡 绳	659
孙中山和同时期亚洲其他民主革命先驱的比较.....	段云章	671
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	郑师渠	682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李喜所	697
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	沈 骏	707
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	方志钦	724
论宋教仁.....	陈旭麓	744
论章太炎.....	唐振常	758

## 下卷

立宪派的阶级背景.....	张朋园	781
论康有为和保皇会.....	汤志钩	789
康梁思想同异述论.....	李 侃	800
张謇在辛亥前夕政治思想的转变.....[加] 陈志让 (Jerome Chen)		819
论谘议局.....	韦庆远 高放 刘文源	837
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	耿云志	851
论清末“新政”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的矛盾.....	夏东元	875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	朱 英	890
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	彭雨新	904
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王 笛	924
督抚与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李振武	941
北洋集团的兴起与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	马平安	957
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	潘洪钢	968
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林家有	977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	隗瀛涛	987	
试论湖北新军向革命的转化	李天松	陈祯琏	996
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	刘望龄	1007	
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	张海鹏	1019	
论湖北军政府政权性质的转变	吴剑杰	1033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政权斗争	李时岳	1043	
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	沈渭滨	杨立强	1050
沪军都督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	吴乾兑	1063	
从江苏、湖北两省若干州县的光复看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兼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的关系	李侃	1072	
台湾与辛亥革命	陈在正	1086	
论南京临时政府	彭明	1102	
《临时约法》与民初政体	刘伟	1117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杨天石	1127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历史环境	胡绳武	1141	
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问题	张玉法	1159	
试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的策略	朱宗震	1181	
试论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	章开沅	1204	
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	卿斯美	1224	
英国与辛亥革命	王曾才	1254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的对华政策	俞辛焞	李探畛	1268
沙俄与辛亥革命	余绳武	1309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	张振鹍	1325	
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	崔志海	1339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	胡绳武	1370	

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	宝成关	1385
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的新课题.....	张岂之	1399
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	虞和平	1408
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	黄逸平	1422
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严昌洪	1432
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	桑 兵	1443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	陈万雄	1460
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龚书铎	1469
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	汪敬虞	1476
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	邱 捷	1488
编后记.....		1513

# 论辛亥革命

吴玉章

—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有名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到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国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进入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化，可以说，都是导向这次革命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侵入中国的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必须经过严重的社会改革，使自己资本主义化，才能同它相对抗。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曾经认为，这种改革也可以用革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日本的方式，即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改良的方式来完成。但是一直到 19 世纪末，清朝政府除了用外国枪炮武装军队和办几个工厂以外，拒绝在政治上进行任何改革。1898 年的戊戌政变就是清朝政府中当权的顽固派拒绝政治改革的坚决的表示。如果当时清朝政府在抵御外侮方面是坚决的，那么，拥护它的人也许要多一些。可是清朝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甚至无能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1899 年至 1900 年义和团发动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清朝政府不但不能给这个斗争以任何有效的支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它又屈辱地订立了《辛丑条约》，承认外国在中国有驻兵权，并赔款 4 亿 5 千万两，分 39 年还清，本息合计 9 亿 8 千万两，以海关税和盐税作抵押，由外国派员监收。这样，中国不仅直接地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威胁，而且还让它们干涉中国的财政收支。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这个条约当时特别使人感到愤慨。孙中山说，以前他奔走革命，人们把他看做危险分子，不敢同他接近；而在此以后，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同情者，主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广大群众爱国心的提高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孙中山所鼓吹的民主革命会得到很多人同情呢？这是因为有了新的社会基

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阶级。它的出现大约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到了 20 世纪初，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为一个阶级了。

试看民族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罢。在 1900 年以前，完全由民间举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 1 万元以上的，有 122 家，资本总数为 2277 万元。到 1906 年，就已经发展到 136 家，资本总数为 2700 万元。其中以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显著。1896 年全国纱厂 12 家，其中华商 7 家；共有纱锭 417000 枚，内华商占 259000 枚；织机 2100 架，内华商占 1750 架。就当时棉纺织业最发达的上海和江苏来说，1902 年上海共有纱厂 17 家，纱锭 565000 枚；1908 年江苏共有纱厂 23 家，纱锭 587000 枚，织机 3066 架。缫丝业的发展也很显著。1895 年上海共有缫丝厂 12 家，1903 年增加一倍，丝机 8526 架；1909 年增加到 35 家，丝机 11085 架；1911 年增加到 48 家，丝机 13738 架。此外，面粉、火柴、水泥、烟草、玻璃、机器制造等各种行业都开办起来了。

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当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正因为不够，资产阶级就更有发展它的要求，对外国资本的威胁更为敏感，对政治改革的关心也更为迫切。以修铁路为例。中国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并不认识修铁路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这次战争以后，由于外国人的鼓吹和自己的觉悟，懂得了修铁路的重要性。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就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铁路。清朝政府早已债台高筑，哪里还有许多钱来修铁路呢？要修铁路就只有借外债。1896 年清朝政府决定成立铁路总公司，派亲美的大买办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主张“借美债，用美匠”来筑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海港和争夺势力范围，铁路投资更成为它们用来巩固在华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个借外债筑路的办法，引起了列强的竞争，也引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对。湖南省有个资本家名叫禹之谟，是长沙的商会会长和教育会会长，1900 年参加过唐才常在湖北的起义活动，1903 年至 1906 年在长沙开工厂，和同盟会一派的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清朝政府在 1906 年夏天把他逮捕起来，并在 1907 年初把他绞死了。他就是资产阶级中反对借外债筑路的一个积极的鼓动者，在做商会会长时期如此，在牢里也如此，并且把反对借外债筑路作为他的遗嘱。

这个时期，“收回利权”的呼声响遍全国。江浙人民为争回苏杭甬铁路建筑权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得到胜利，更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对借外债开矿也是在当时资产阶级中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山西曾经有些人自动筹集资金，从英国人手里把矿权赎回来。反对借外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事件，其他各省也曾陆续发生。

在这个时期里面，爱国运动差不多是一触即发的。1904 年冬和 1905 年初，由于反对美国要求续订中美华工条约，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个运动波及十多个省的大小城市。

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外的，这就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从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从工人出身的，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

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就是从华侨里面开始的。孙中山本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他的哥哥早年到檀香山经营畜牧业发了家，他小时候就到那里依靠他哥哥读书，所以他本人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他所建立的兴中会，华侨占会员总数 78%，其中有 48% 是华侨资产阶级。他后来在沿海各地从事武装起义，也都是靠华侨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的。

这些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确实是要求政治改革的。但是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当时资产阶级还很弱小。革命派所以对革命具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化。

1903 年至 1911 年间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是很低的。但是在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以前，不少人还可以勉强地用各种方法来维持生活。例如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很久以来，都是男耕女织，兼营副业或手工业，在封建统治下过着十分低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二十年间，外国人还为上海和广州附近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普遍而感到震惊。可是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农村出产的土布就开始为廉价倾销的外国货所代替。其他如丝织品和瓷器本来都在出口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时却都因出口的减缩和人口的增加而衰落下去。这样，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活路少了，同时清朝政府的捐税和地主的剥削反而加重，他们的生活自然更为困苦了。所以在这个时期以“抗捐”、“抗税”、“抢米”一类口号发动起来的农民暴动，一年年有加无已。从 1907 年到 1910 年，仅长江中下游所发生的“抢米”、“抗捐”事件，就有八十多起。1910 年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参加的群众都有几万人。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很早就参加过革命斗争。1906 年安源煤矿工人六千余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1911 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起义来响应资产阶级反对清朝政府“铁路国有”运动。此外，工人为改善本身生活条件曾进行过多次罢工斗争。

这个大动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趋瓦解。在这个大动荡中，不仅许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起来反抗，而且也有不少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表现不安，想寻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出路在哪里呢？当时封建主义已经毫无出路了。要出路只能跟资产阶级跑。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卷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不是变成孙

中山的信徒，就是变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信徒。

正是由于全国人民日益明显地倾向于革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组成的，成分不一，但都是反对清朝统治的。1905年，这些地方性的小团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除了推翻清朝政府以外，还主张建立民国，并且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就是辛亥革命的纲领。

## 二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以前的10年间，革命形势已经相当高涨了。从人民方面来说，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从统治者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倾向于革命；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就力图缓和革命，以便从危机中挽救自己。所以清朝政府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不能像戊戌政变前后那样顽固了。它陆续颁布了一些实行改革的命令。这些改革包括：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裁冗员、设立商部并对民族工业采取保护政策等，都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求之不得的。但此时人民对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比“戊戌”时期大为提高，清朝政府尽管实行了一些改革，也不能使人们感到满意。清朝政府迫不得已，在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表示同意立宪，1908年宣布筹备宪政期间为9年，到1917年完成。1907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宣布对兴办实业的人给以奖励；投资2000万元以上者赏一等子爵，投资10万元以上者赏五品衔。这些措施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并且许诺了更大的让步。

清朝政府所实行的和许诺的这些改革，引起和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的改革是虚伪的，诺言是靠不住的，必须推翻这个政府才能建立民主制度；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他们认为，清朝政府的改革尽管是虚伪的，诺言尽管是靠不住的，但是已经有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与其忍受革命的痛苦，不如用合法方式来争取政治改革的进一步实现。

当清朝政府还在拒绝改革的时期，革命派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且和立宪派有了意见分歧。到了1905年前后，这种分歧越来越大。结果，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发生了分裂。

这种分裂在 1909 年以后更加显著。因为在这个时期，清朝政府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谘议局，这是一种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机关。资政院照规定设议员约 300 人，其中 125 人由皇帝委派（其中王公世爵 10 人，宗室 5 人，中央各部院官员 100 人，业主资产在 100 万元以上者 10 人），另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本省议员定额十分之一，约一百六七十人。各省谘议局议员由各县选举，凡在当地办教育或其他公共事业三年以上的，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举贡生员以上出身的，曾任文官七品、武官五品以上的，在当地有 5000 元以上工商业或不动产的，都可以当选。按当时全国 23 个省区计算，共有议员 1677 人。谘议局可以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预决算、税法、公债以及本省担任义务之增加等。这样的机关对于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参加进去了，有些人还被推举为议长。

全国各省谘议局的设立，除加深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外，还有两种作用值得注意。

第一，它具有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这个机关既是议会性质的，各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要求改革的人很多都被选进去了，就立即成了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讲坛。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请愿立宪的运动也日甚一日，政治改革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结果，清朝政府只好继续让步，本来宣布在 1917 年实行宪政，此时又宣布提前四年，在 1913 年实行宪政。然而这种让步仍然不可能使人感到满意，甚至谘议局的议员们也有很多人因为清朝统治者缺乏进行改革的诚意而失望。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反对借外债筑路的运动，山东、山西等省反对借外债开矿的运动，也都是在谘议局里面哄闹起来的。这些运动都关系到一般群众的利益，议员们越是闹得凶，卷入的群众也就越多。群众是反对清朝统治的，他们既然参加进来，就把议员们的运动变了质，变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了。所以，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绝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

第二，谘议局也起一种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参加谘议局的资产阶级分子多数是属于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民主改革，然而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改革。现在他们又同地主阶级的绅士们在谘议局里面形成一条要求政治改革的阵线，就势必要进而反对社会的民主改革了。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谘议局是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国内所占有的巩固地盘，它使得革命派在革命爆发以后完全处于劣势。立宪派成了主人，革命派成了客人，而主人是同封建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们可以对谘议局的作用作这样一种评价，即：它在革命以前，一方面

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一方面因为要求政治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反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革命以后，它虽然竭力表示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但是因为它和旧势力在一起形成了对抗革命派的联盟，在实际上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 三

从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到这些团体的联合，建立起同盟会，这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这个发展考察一下，就可以看见，它的成就主要是产生了一个共同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说了三件事：（一）推翻清朝政府；（二）建立中华民国；（三）平均地权。其中，建立中华民国和平均地权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贡献。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历来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人都以恢复明朝或者建立汉族帝国为口号。1894年兴中会所提出的纲领中有建立合众政府一条，但是什么叫合众政府呢？这个名词很可能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脱胎来的，那么合众政府也就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之一种。但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提出民主主义的政治概念。可见兴中会时代的革命思想也是不够明确的。同盟会成立以后，建立民国的思想很快就普遍起来，建立汉帝国的话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了。所以同盟会纲领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平均地权更是一个新的理想。这个理想表明，比较西方资产阶级后进的中国资产阶级希望他们的共和国能够因为同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获得长久的寿命，不致在革命以后不久又发生第二次革命。

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同盟会的三条纲领里面究竟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平均地权，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朝政府。行动的要求首先是推翻清朝政府，这是不待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推翻清朝政府。是为了建立中华民国吗？当然有许多人是为了建立中华民国而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这些人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简单地反对清朝政府而主张革命的，这种人各阶级都有，非常普遍。他们痛恨这个政府不仅因为它的腐朽无能和它所带来的民族灾难，而且因为它主要是由满洲贵族所掌握并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有的人甚至说，即使清朝政府实行民主改革，也必须推翻它。资产阶级利用了广大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来鼓吹革命，这是对的，不过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这种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这样

鼓动起来的。但是这种宣传有很大的弱点。反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放过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同样，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没有批判、反对那长时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过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也就是支持了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因此，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做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 17、18 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 19 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目前我国翻译出版的许多外国古典著作，其实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应当由资产阶级学者翻译过来的。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的缺陷。

我们应当承认，那些热烈地充满反满情绪的革命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他们满腔热血，慷慨悲歌，处处表现愿意为推翻清朝统治而献出整个生命。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然而这些勇敢的人们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例如，在组成同盟会的小团体里面有这样一个团体，叫做光复会，又名复古会。它的会员有的拒绝参加同盟会，独立行动，著名的烈士徐锡麟就是其中的一人，他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人参加了同盟会，可是不久又主张分裂，著名的学者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1909 年竟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辛亥革命以后立即宣告脱离同盟会，另组小派别。

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积极地领导了武装起义。他认为清朝统治到了 20 世纪初期已经好像一座破屋子，只要抽掉里面的一根木头，或者挖倒一面墙脚，就会整个塌下来。所以他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联络会党和筹款，都是为了组织起义。但是他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他经常组织一批武装的敢死队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那些住有清朝防军的地方进行突然的袭击，既没有接济，也没有当地群众的援助，联络工作又做得不好，结果每一次都失败了。1910 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那些领导起义最积极的分子如赵声、黄兴等，因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都有些灰心丧气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如果不能继续推动革命，岂不太可惜了吗？于是孙中山会同黄兴等人提出一个办法，决定集中全力，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这就是著名的 1911 年夏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起义失败后，广州人民把牺牲烈士葬于黄花岗，故又称黄花岗之

役)。这次起义仍旧是采取老办法，招集了各省的同盟会员，组织成八百多名的敢死队，运了七百多支枪和三百多颗炸弹到广州去，在那里设立了近四十处机关，许多人写了绝命书，成功失败在此一举。结果又失败了，不过影响很好，它使人们感到振奋，使清朝腐败无能的官吏大为惊慌，他们简直失去了应付革命的能力。

但是同盟会本身因为起义失败而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许多优秀干部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更重要的是，同盟会失去了主宰。孙中山虽然继续在美国华侨中进行筹款，准备起义，但并没有实际领导同盟会的工作。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赵声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生起病来，不久就在香港死了；黄兴因事败而心灰，束手无策；胡汉民躲在香港，连人都找不到。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组织虽然号称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从它所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的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

一个革命团体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要在革命胜利以后保持一个统一的阵线，那就太困难了。

#### 四

辛亥革命的爆发不在别的地方而在武汉，并不是偶然的。在1904年以后，这里已经建立了革命团体，并且有人坚持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在辛亥革命以前，这里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文学社，一个是共进会的分会。共进会是一部分同盟会员把各省的会党联合起来成立的，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湖北新军共约八千多人，参加文学社的已有五千多人，还有许多参加共进会的。当时这两个团体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湖北的新军，它们组织了统一的指挥起义的机关，准备起义。后来这个机关遭到破坏，领导者有的被逮捕杀害，有的分散隐匿起来。但是因为多数士兵都成了革命分子，要求起义的情绪非常高，所以在没有领导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地发动起义，创造了革命的第一个胜利。

然而也正因为起义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形下发动起来的，士兵们在起义获得初步的胜利以后就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迎头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政权，必须有人出头。当时群众还没有觉悟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应当自己出头来领导，而是希望别人来领导，把政权让给他。前一晚上起义，因为没有人指挥，临时抓来一个连长，强迫他指挥，现在再强迫他组织政权，他说什么也不敢干了。只得另外找人，找谁呢？结果找来了谘议局议长、立宪派汤化龙，他又是个文人，不能领导军队，还得找个武官，能领导军队的。后来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原湖北新军的旅长黎元

洪。士兵们用枪指着他，强迫他当湖北军政府都督，他坚决不干，就把他关起来，同时用他的名义发表文告，使他下不了台。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为的是留一条后路，将来革命失败，他可以推说他是被强迫的。过了几天，形势好转，他也就答应干了。这样一个人竟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元勋。

既然黎元洪出来了，汤化龙出来了，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也就都出来了。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些建立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元勋们——起义的士兵们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就一天天缩小，尤其是那些起义的士兵们，有许多竟被杀掉了。当初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人，后来提到这件事真是痛心不已。

本来同盟会设想在起义胜利以后首先是组织军队，然后一路打过去，打到什么地方，就占领什么地方，最后占领全中国。但是武昌起义以后的情形同设想的大不相同，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传檄而定的。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宣布独立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各省宣布独立的形式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形式，和武昌差不多，主要是新军士兵的起义，起义以后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结果政权落入了立宪派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手里，再由立宪派把旧势力拉出来掌握政权。例如陕西就是如此。

第二种形式，就是群众起来了，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派掌握了政权，但是立宪派和旧势力一反攻，就把政权夺过去了。湖南就是如此。湖南也是新军起义，有革命派领导，他们把巡防营统领杀掉，自己掌握了政权，可是立宪派马上来一个政变，把革命派全杀掉了，他们和旧势力掌握了政权。除湖南以外，贵州也是如此。

第三种形式，就是当群众起义尚未爆发的时候，当地一些立宪派人物就利用下层群众起来的形势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员自动宣布独立。结果宣布独立以后，政权还是落在清朝政府的旧官员手里。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大家劝他独立，他就举行一个仪式把自己的官衔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马，只是换一块招牌。

第四种形式，比如云南，爆发了战争，新军和旧军队打了仗，新军赶跑了旧势力，改变了政权。

还有一种形式，比如四川，情况更为复杂，自 1911 年 5 月以来，由于清朝政府把民办川汉铁路收为国有以借外债，引起了四川广大民众的激烈反对。川汉铁路原来是四川民众为了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倡议兴筑的。他们发起用“租股”的办法来筹集资本，“按租出谷，百分取三”。因此，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四川保路运动原先是立宪派所控制的谘议局领导的，他们为了扩大斗争力量，就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想利用四川拥有广大群众的哥